

我在永安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回忆

蔡 力 行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福建永安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创办过联合新闻社、《联合周报》和联合编译社。兹就记忆所及略作介绍，以供研究福建新闻史料者参考。

一 联合新闻社

抗战时期的福建永安，不但是福建战时省会，也是东南的文化中心。许多共产党人、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纷纷来到永安，从事抗日救国的文化活动。特别是著名进步作家黎烈文来主持改进出版社，出版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等多种刊物以及大批进步书籍，掀起了第一次进步文化活动的高潮。

我是 1942 年下半年到永安担任国民党《东南日报》特派员兼永安办事处主任的。前一个身份是负责采访新闻，后一个身份是管理发行广告等业务并代表报社对外联络。那时候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镇压共产党和抗日党派，疯狂摧残进步报刊。东南一带文化活动死气沉沉，永安也不例外。因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怨恨蒋介石剥夺其兵权，对蒋不满，在日寇步步进逼的形势下，他考虑到福建可能与大后方隔绝，希望联络一些进步力量，创造一个安定自保的环境。这是发展进步文化活动的有利条件，正可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创办一点新闻出版事业。

但是 我初到福建 人地生疏 如果要办刊物 经济上有困难，所以决定先办一个通讯社，向各地报纸专供稿件，通过报纸来从事抗日宣传。

当时我国的通讯社都规模很小，设备简单。这种情况是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无法想象的。国民党统治区最大的通讯社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它在各省、市都有分社。它的业务只是向各地报纸供应国内外新闻，对外地报纸是用无线电发布，对当地报纸则用腊纸油印后分送。至于地方通讯社，则只要一架油印机就行了。这一类的通讯社，各地都有。

当时比较有名的民办通讯社，首推范长江在桂林办的国际新闻社。它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为后盾，拥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它发行一种通讯稿，名称为《国际新闻通讯》，内容为国际新闻的报道分析，普遍供应各地报纸采用。另外还有一种特约稿，是国际问题专论，由专家执笔，不定期供应，每一地区只供给一家报纸，可以用“本报特稿”的形式发表，很受报纸欢迎。这两类稿件都要事前预订。

我当时就东施效颦，想办一家像国际新闻社一样的通讯社，并给它起个名，叫“联合新闻社”。顾名思义，含有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国内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意思。

联合新闻社大概是 1943 年成立的，具体日期已记不清。当时通讯社的收入，主要依靠报社付给的稿费，数量极其有限，不能应付开支。我想了一个点子，设法吸收其他订户，来增加收入。我考虑到当时大家都关心沦陷区的情况，特别是江苏、浙江逃亡来的人，更盼望得到家乡的信息，所以便编发《敌伪研究通讯》每 10 天出版一期，用铅字排印，16 开本。内容包括战争形势评论，敌伪活动情况等等，由蔡振扬、刘独峰和我合编。他们两位都是义务帮忙的。这种通讯，除了供

给各地报纸采用外，还公开征求订户，机关团体订阅的不少。另外也和国际新闻社一样，发行特约稿，专门供给报纸采用，每一地区限于一家报纸，可以用“本报特稿”名义刊出。金仲华、刘思慕、千家驹、蔡振扬、刘独峰和我都写论文。这些论文都很精采，各地进步报纸采用的很多，重庆《新闻日报》也采用过。说明这一个小小的通讯社，还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联合新闻社大概办了一年多就停办了，正如昙花一现。停办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日寇步步进迫，作战地区扩大，而我们的稿件是全靠邮政投递的，因受交通阻隔，我们与外地报纸联系困难。另一方面通讯稿是通过各地报纸发表的，要受报纸立场的限制，不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团结抗战。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已在福建站住了脚，有条件可以创办刊物了。

二 联合周报

《联合周报》创刊于 1944 年 2 月 3 日。我是发行人。编辑人是蔡振扬、刘独峰、马义和我一共 4 人。姚勇来（姚隼）、沈嫫璋、萨一佛等实际上都参加编辑工作，但因为当时环境太恶劣，所以没有公开露面。

张和陆同志在《坚持抗战争取进步的〈联合周报〉》一文中介绍这一刊物是由《东南日报》永安办事处编发，这是误会。我当时虽在《东南日报》工作，但这一刊物是我私人创办的，与该报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我当时是《东南日报》永安特派员兼永安办事处主任，曾利用这个关系，赊欠福建省政府印刷所的印刷费。又在《东南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大半版的广告。并且在发行《东南日报》的时候把《联合周报》的创刊号夹在一起免费附送。这样一来引起一场轰动，吸引了不少读者订阅，第一炮就此打响了。但是出版单位在刊物上明明白白写着联合周报社并不是《东南日报》永安办事处，这是关系历史真实

的问题，有必要说清楚。

《联合周报》创刊初期是采用报纸形式 四开纸一张 分 4 版。第一版是专论、每周短评、世界短新闻；第二版是《工作、生活、学习》版 第三版是《天下行脚》刊登各地通讯 第四版是文艺创作，取名《笔会》。所有刊头都是木刻家萨一佛设计和雕刻的。因为当时无条件制版，只好用木刻，但仍然很精美。创刊时所以决定采用报纸形式，是认为可以多排字，以较少的篇幅容纳较多的内容。可是发行以后，便遇到难题。因为刊物是通过书店销售的，一般的书店都在桌子上陈列各种期刊，没有摆报纸的地方，以致销路受到影响。因此，第二卷起便改用期刊形式，为 16 开本 每期 16 页，内容除了原来栏目外，增加《世界侧影》和《文化消息》，前者刊登一些国际资料，后者介绍各地文化活动情况。封面刊登木刻画。另外，还有长篇小说连载。

《联合周报》的宗旨是办一个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刊物。这是由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针所决定的。这个刊物创办的时候，虽然没有接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也没有共产党人参加工作，但一直坚持宣传爱国和团结抗日的方向。

在皖南事变以后万马齐喑的日子里，《联合周报》诞生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舆论封锁线上打开个缺口，为进步文化运动增添了新力量，因此受到各地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的热烈鼓励与大力支持。重庆《新华日报》经常在第一版上免费刊登广告，各地的进步报纸也采取同样行动帮助我们，使这一刊物的影响日益扩大。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不断赐稿，如郭沫若、金仲华、千家驹、刘思慕、王造时、王亚南、郭大力、羊枣都经常撰写论文，黎烈文、王西彦、谷斯范、徐中玉、孙用写过不少文艺作品。孙起孟还写一系列的青年修养讲话。这些文章激励

着广大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英勇斗争。羊枣烈士临终前在留给夫人沈强的遗言中嘱咐收集其遗文，也提到《联合周报》发表的几篇，从另一侧面证明这些文章的宝贵价值。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秘密。《联合周报》中有些文章是转载自重庆《新华日报》的。例如创刊号陶行知的《创造宣言》一文。其他还有巴金、章乃器、朱自清、杨荣国、茅盾、唐弢、艾芜等人的作品。由于战时交通阻隔，东南读者很难看到《新华日报》我们把它转载过来 是很有意义的。

联合周报社除了出版刊物之外，还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最先举办的活动是“覃子豪萨一佛永安劫后诗画合展”。1943年11月，日寇飞机空袭永安，大轰炸后，大火烧了3天3夜，整个山城变成火海，成千名无辜百姓惨遭横祸。画家萨一佛怀着悲愤的心情，走遍灾区，把敌人的暴行描画下来。这是敌人暴行的铁证，也是我们正义的控诉。不久，诗人覃子豪来永安。我请他逐幅配诗，更增加了感染力和煽动力。经过一番筹备，借福建省参议会大礼堂举办展览。一连数天，参观者络绎不绝，莫不激起万分仇恨，增强抗敌意志。美国新闻处布朗从重庆到永安，也来参观展览，选拍不少画面，寄给美国报刊发表。这个画展，还曾用别的单位的名义，在建瓯、南平、沙县、漳州各地展览过。

萨一佛到美国新闻处后（萨应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处长柯道威之聘，任该处美术部主任）不久，我便和他商量，由美国新闻处供应图片，以联合周报社的名义，举办“时事图片展览”。因他的精心策划、周密挑选，每一幅照片，都生动地反映了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大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日军发动湘桂战役后，留在桂林的大批文化人需要撤退。

我在报上看到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著名进步作家张天翼贫病交迫的消息，又知道著名进步作家王鲁彦、木刻家万湜思不幸逝世、家属生活困难的情况，乃决定由联合周报社出面，发动“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一方面在《联合周报》副刊《笔会》上出版专刊，进行宣传鼓动。一方面利用“时事图片展览”这个机会，公开向社会募捐。还起草了四封慰问信，请群众签名表示慰问。当时观众自动签名和捐款的人很多，会后又继续征求签名和募捐。这对当时这几位作家和家属不无小补。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尊敬进步作家的社会风气，对进一步推动战时进步文化活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湘桂战役之后，日军占领了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地区，把东南沿海各省与大后方完全隔离开来。《联合周报》的发行范围越来越缩小，销路减少，经济困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把向农民银行贷款建造的房子卖给美国空军的一个单位，另租私房作社址，将余下的钱补贴印刷费和开支。这时，我的妹夫苏任予由广东来福建，帮助编辑工作。中共地下党员李达仁、叶康参也帮助写每周短评（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身份）。

《联合周报》创刊前后这段时期，正是永安战时进步文化运动再度兴起的时期。第一次高潮是黎烈文推动的，第二次高潮则是应该归功于谌震和羊枣的努力。进步新闻记者谌震利用他是省主席刘建绪随从秘书的身份，公开推动进步文化运动。在1943年3月创办了《建设导报》同年10月又联合一批进步文化人创办了东南出版社。这在当时是一个立场比较鲜明、实力比较雄厚的出版社。次年夏天，著名经济学者王亚南应聘担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军事评论家羊枣（杨潮）也来永安。他们先后办起了《国际时事研究》

半月刊和经济科学出版社，使永安的进步文化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们除了从事本身的科学研究和出版事业之外，还经常地无私地给予《联合周报》热情指导和大力扶持，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联合周报》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为了使《联合周报》更进一步地发展，也为了促成进步文化力量的紧密团结，便希望和东南出版社合作。协商成功后，我成为东南出版社的股东、编辑部主任、《联合周报》主编。《联合周报》从 1945 年 1 月 1 日第 2 卷 19 期起改由东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封面改用土道林纸印刷，封面封底四面全刊登时事照片，内容也更加充实了。

我除了编辑周报之外，还要负责其他出版物的组稿、编审、校对等一连串的工作。后来因经理李力行和工人相处不来，又要我兼任印刷所主任。日夜操劳，费尽心力，工作的繁忙和艰苦是现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与东南出版社合作约半年后，我因为待遇问题，对谌震有些意见，双方发生矛盾，我便退出东南出版社，将《联合周报》收回自办。我租了一家印刷所，准备排印新的一期，却被国民党福建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勒令停刊（实际上仍是在东南出版社出至第 3 卷 16 期停刊的）。《联合周报》总共办了一年半。

三 联合编译社

《联合周报》停刊还不到 10 天，震惊中外的永安大逮捕开始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对当时进步文化活动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大批的文化人被逮捕，东南出版社被查封，《联合周报》和《国际时事研究》被迫停刊。但是在狱外的其他文化人并没有被吓倒，仍然千方百计沉着应战。我当时考虑到环境非常恶劣，必须改变斗争方式，决定办一个出版社。还

是打联合牌，定名为联合编译社。先出一套《联合文艺丛刊》，计有黎烈文翻译的《战斗在顿河》、彭世桢翻译的《俄罗斯母亲》、谷斯范著的《紫藤花》等。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编译社又先后出版谷斯范著的《新水浒》、张光鲁编的《爱国老人陈嘉庚》和《自学手册》。《爱国老人陈嘉庚》一书中 有陈嘉庚率领华侨慰问团访问延安的记载。编译社还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翻译出版。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曾在报头免费刊登广告，广为介绍。

抗战胜利后，联合编译社迁到福州，在市中心和仓前山设立两个发行所，还在市内设立十多家特约经销处，积极推销本社出版的书籍及上海进步刊物如《民主》、《周报》、《世界知识》、《人民世纪》等等，并且特约经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萃》周刊。

1946年秋天，联合编译社迁到上海，在福州的发行所便停办了。搬到上海后，集中力量出版刊物，先后出版《现代新闻》（与章伯钧合编）《现代经济文摘》、《现代文摘》、《新诗歌》等刊物。1947年我被军统中统联合逮捕，所有刊物被迫停刊。恢复自由后，又先后出版了《内幕新闻》丛刊和《群言》周刊。上海解放前夕，编译社秘密印刷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著作 在上海解放第一天，便公开发行。不久，联合编译社停办，完成了历史使命。

战时永安国防戏剧运动简记

江 之 水

1936年，中国戏剧界配合1935年整个文艺界提出的“国防文学”的总口号而展开的“国防戏剧”运动，波澜壮阔，历时近十年。在这里，先说一下何谓“国防戏剧”。溯源之，应是上海剧作者协会订出了一个国防剧作的纲领，这个纲领大致包括的要点是反日寇反汉奸，材料是现阶段国难事实，英勇的抗敌反汉奸的行动，对于汉奸理论与行动的暴露批判，新闻事件的反映，外国和祖国历史的民族抗战事迹，以及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必须也应取材于反封建的故事。这就是“国防戏剧”运动最早的含义。

的确，当时的许多创作家亲眼目睹，有些甚至亲身经历过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家破人亡的惨痛事实。激于爱国的情，发于痛恨日寇的愤怒，同时也是正义作家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他们在“国防戏剧”的号召下，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爱国的剧本，如宋之的创作的《出征》，于伶先生创作的《警号》、《撤退》、《赵家庄》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神圣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认知下联合起来了。先有剧作者联谊会之组织，继而成立中国剧作者协会。南京失陷之后，剧作家在武汉组成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中国剧作者协会成立之后，集体创作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上海各大剧团争相演出，揭开了抗战戏剧的序幕。“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国话剧运

动中心的上海立即成立戏剧界救亡协会，将大小剧团组成 13 个救亡演出队，分赴各地城乡、抗战前线，作广泛的宣传演出。他们不论在那里演出，台上台下均表现同仇敌忾，收到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极大效果。如，《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秋阳》、《八百壮士》、《公敌》、《上前线》、《火海中的孤军》等等，皆揭露了日寇之残暴，反映了沦陷区广大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和他们抗击日寇的勇敢精神，表现中国士兵在前线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伟大气概。综观而言，战争扩阔了中国戏剧界的内容，不少剧目的内容也以抗日或宣示对战争的感情为主线，对促进全国“国防戏剧”的运动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1938 年，随着沿海城市相继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永安成为福建省的战时省会。许多省政府部门、文化、教育、新闻等单位纷纷内迁山城永安。由此，包括沪、宁、杭的大批名流学者和文化人士辗转来到燕江之滨，使仅有 7000 人的永安县城一下子沸腾起来，抗战烈火在这里燃烧了七年半之久，使永安成为可与重庆、桂林、昆明齐名的东南文化中心。

在战时永安，演绎了一场国防戏剧运动的悲喜剧，尤为引人注目。从省城迁徙到山城的原福州实验小剧团、省话剧院研究会、七八剧社、抗敌剧团等戏剧团体和艺坛名流，高举抗战‘国防戏剧’的旗帜，高喊‘文艺工作者到街头去’的口号，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战，其声势之大，令后人感佩不已。

期间，省民众教育处实验小剧团首举义旗，从 8 月开始，接连举行大规模义演。演出了《谁是仇敌》、《时代英雄》、《一颗炸弹》、《夜光环》等剧目，除了《一颗炸弹》外，其他均用普通话。这几次公演，观众多是知识分子，一般群众不易看懂。但他们也不断地演出街头戏与庙台戏，让演出的戏剧起到深入

民间，激发民众的作用。至于后台工作，其布景很平淡，但是灯光还不错，彩色分配较均匀，《中国妇女》的最后一场还用了剪影式灯光，这是过去福建未有人做过的。除了参与公演外，实验小剧团还每月在民教处施教厅举行一次抗战戏剧施教活动。且每次演出前，剧团都将戏票分配给市区一般民众，使他們有更多看戏的机会。所以，每次演出，观众都挤得水泄不通，不断地鼓掌叫好，其效果足可说明。之后，实验小剧团到全省各地巡回演出。实验小剧团大规模公演和巡回演出，点燃了我省抗战国防戏剧的导火线。

1938年，福建省教育厅成立了戏剧教育委员会，下设战时国民教育巡回剧团，简称战教团。次年易名民众教育第一巡回施教团，简称民教一团，另组二、三团。为当年永安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另一支职业剧团。其剧团负责人一再更换，但以剧作家陈启肃任团长、林舒谦为教导员历时最久。11月，战教团首演于永安。此后每月公演一次。上演戏剧有《为国牺牲》、《生死战》、《喷火口》、《菱姑》、《战》、《县长太太》、《毒》、《仇》、《黑箱》、《同一条战线》、《落日》、《自投罗网》、《徘徊着的女人》、《三叉口》、《卢沟桥之战》、《血城》、《死的胜利》等20多个节目。除了独幕剧外，还有多幕剧。这些剧目都是战教团成员的创作，其中大多出于陈启肃、林舒谦之手。福建省教育厅长郑贞文是个爱国人士，也亲自创作歌剧《保卫福建》（由蔡继昆配曲）。这些剧本多是反映人民群众高昂的抗战情绪和爱国志士坚贞不屈的斗争，同时暴露日寇侵略暴行和汉奸无耻卑劣的面目。由于节目浅显通俗，易导易演，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鼓动和教育作用。此外，战（民）教团还排演了曹禺的《日出》、于伶的《夜上海》、《杏花春雨江南》、邵荃麟的《麒麟寨》等。其中，《麒麟寨》是邵荃麟中共党员、文艺评

论家)生前唯一的四幕剧。此剧情节很简单,描写的是爱国志士肖子青打入匪窟麒麟寨,动员寨主邓九爷抗日,邓之把弟胡二爷(胡一尧)受汉奸蛊惑,从中阻挠,最后胡一尧将肖拷打至死。此剧于1940年在永安出版后,省内各地久演不衰。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省、三明市和我市联合举行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大会和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来宾云集,盛况空前。9月8日晚,经赖承光改编的《麒麟寨》再次搬上了永安的戏剧舞台,永安影剧院座无虚席,当剧终落幕,许多观众尤其是当年归来的幸存者,思绪万千,泪如泉涌,久久不肯离席。这是后话。

还有,再那艰苦的岁月里排演节目颇为不易。1939年夏民教团在下吉山防空洞排演《喷火口》、《三叉口》时突遇敌机轰炸,外面街上一片火海,血肉横飞,惨状更激起团员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大家同仇敌忾,以昂扬的斗志赶排节目。公演时演员很投入,台下鸦雀无声。公演一结束,满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自发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来不及卸装的演员也深受鼓舞,与群众同声演唱,全场气氛激越。

在抗敌剧运的推动下,更多的是抗战业余剧团的纷纷成立。为了动员群众,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战的洪波中去。省高级农校师生组织的业余剧团于1941年5月演出了刘念渠、宗由合编的《北地狼烟》,对激励人民抗日斗争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吉山的永安中学也成立了话剧组织,演出了如《马百计》等抗日话剧,搭台演出,连永安城里的人都跑到吉山看他们表演。1944年,在吉山的国立福建音专教授陆华柏为了响应冯玉祥将军踊跃献金支援抗战的号召,创作了一出新闻清唱剧

《白沙献金》在永安城义演。义演的剧目还有《故乡》、《春燕》、《大禹治水》等，这些剧目多是音专师生创作的。大湖永安师范每星期六晚上，师生们组织抗战戏剧、歌咏、舞蹈演出，有时还到乡下巡回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在国防戏剧的旗帜下，永安当年还出版了许多剧刊。比较著名的有省抗敌后援会抗敌剧团主编的《抗敌戏剧》半月刊，省教育厅教育委员会的《剧教》（1940年创办，林舒谦主编）《福建剧坛》（1941年创刊 陈启肃主编）以及1942年10月第一巡回施教团创办的《剧讯》（石敬明主编）。这些剧刊主要刊登以抗战为主题的剧本、剧评、各地戏剧动态，以及戏剧史料等，保存了大量抗战国防戏剧运动的资料。此外，《战教导报》（半月刊 许钦文主编）《现代青年》等报刊也刊登了抗战的剧本、剧评。

在“国防戏剧”运动的感召下，永安抗战舞台繁花竞秀的景象，引起国内艺坛的瞩目，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在重庆举办了“全国教育展览会”，“福建戏剧工作被评为第一，而且参观者惊奇福建戏剧之成就”。这些评论至今都足以使永安人引为自豪的。当然，抗战以后的戏剧已不再具备尖锐的战斗意味了，取而代之是摩登的舞台剧。但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忘记这些激励人心的抗战戏剧，这些陪伴他们捱过抗战八年的精神食粮！

战时的永安商业

林 仲 阵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翌年五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从福州内迁永安后，省属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学校以及福州等地商人随之而至，使这个小山城成了福建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这时，县城人口由战前的不足一万人随增为三万余人。省会内迁永安，尽管处于战乱年代，却仍促进了永安商业从闭塞的圩集市场成为一个消费城市，不但商店，各行各业逐渐增多，还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商业机构和官办的商店。这一时期的永安市场，各行各业的商业网点、经营措施、商品购销渠道等方面的呈现畸形发展之势。

一、省、县设置的商业管理或经营机构。

1、省贸易公司。民国 27 年(1938 年) 省贸易公司从福州迁至永安，董事长徐学禹，总经理林萱。

2 县盐务运销所。成立于民国 30 年(1941 年) 3 月，所长陈果。为加强食盐供应管理，同年 10 月 5 日成立县战时食盐配销协进委员会，由县长张丹崖任主席，县商会主席邓国祯，常委赖德炜等五人为委员。其主要任务是：1、审核、抽查各乡镇及机关团体、部队食盐的供需情况；2 调查盐子店的分布情况；3、监督县食盐配销人员及盐子店开展业务事宜。至民国 31 年(1942 年) 5 月，奉省盐务局训令撤销。

3、县公沽局。民国 30 年(1941 年) 省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永安县为“粮食征实”试点，同年 9 月 21 日，永安县公沽

局成立(地址设在城关晏公街)同时在贡川、上坪、槐南、曹远、安砂、西洋、黄历和燕溪等乡镇设立 8 个粮食收购点,其任务是:1、实行粮食公沽办法,2、禁止粮食自由流通,3、机关、学校和城市居民计口供应粮食。后因公沽法带来粮荒后果,于民国 31 年(1942 年)6 月撤销。

4、省日用品联合办事处。民国 31 年(1942 年)5 月,福建省会日用品商业同业公会共同购运联合办事处成立。

5.省卷烟专卖局于民国 30 年(1941 年)3 月在永安成立,省公沽局、省贸易公司营业所也相继成立。

二、官办商业企业。

1 省贸易公司办的中南旅运社。民国 27 年(1938 年)省会迁永安后,为提供国民党官员及盟国贵宾交际娱乐场所,特在永安城关新华路(即中正路)建造中南旅运社,成为永安有史以来第一家官办商业企业。

中南旅运社为二层木质楼层房,内设旅社、食堂、浴室、理发、百货商场、小车出租等部门,设备豪华、摆设讲究,膳食精良。常住中南旅运社的有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厅长严家淦、丘汉平、包可永、徐学禹等。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每星期一必定在此聚会。

民国 28 年(1939 年)9 月 18 日,日机轰炸永安邢厝池,中南旅运社新楼房一座被烧夷弹烧毁,后迁永安城关横街。民国 37 年(1948 年)1 月 24 日,中南旅运社移交永安县政府,改为永安县社会服务社,采取自给自足经营。

2 县办四维商店。民国 29 年(1940 年)9 月间,永安县政府在吉山(省政府主席公馆)开办四维商店(经理林鹤年)。四维商店属县政府建设科管辖,是本县公有营业企业,店内员役均由政府委派。资金一万元(法币,下同)由地方款项筹出,营

业盈亏归公，营业收入由店填日报表、旬报表及月报表呈报县政府。现金一律上缴国库，商店每月经费由县政府支付。四维商店于民国 30 年(1941 年)4 月迁入永安城内，同年 8 月 9 日遭日机炸毁，损失一万余元，后停业。

三、私营商业

1 私营商店及其商业网点。省政府内迁永安后，大批福州等地商人也随之而至，本县商民中逐渐形成福州帮、江西帮、土帮（即本地帮），但无明显体系。这一时期永安商界已有百货、棉布、京果、饮食、国药等 23 个行业。由于历史原因，粮食、银行、汽车、挑挽等行业也统归商会管辖。民国 32 年(1943 年)6 月，县政府建设科呈报省政府建设厅称：永安有证商店共有 364 个（不包括作坊、摊贩）。这些商店大部分分布在城关的中山、西门、中华、大同等主要街道。私营座商有中山路 75 家商店 西门街 16 家商店，中华路 59 家商店 大同路 10 家商店。较大的行业有六个，其中杂货行业有商店 93 个，饮食业有商店 32 个，粮食有商店 21 个，百货棉布有商店 16 个，国药有商店 13 个，旅社有 7 个。据民国 33 年(1944 年)调查资料：永安私营商业资本为 10 余亿元，商号中资本最多 2000 多万元，最少数 10 万元。

当时，永安县主要行业较大的商店有：

1 布匹业——久安顺(后改正记)复兴荣、裕丰、慎生泰、同益、九大祥、刘建顺、裕华等。销售的花色品种，以人民所需较畅销的货色为主，如冬季是兰、灰色斜纹、假哔叽、纱卡叽等，夏季是多样的洋布、府绸之类，至于高档绸缎、呢绒、真哔叽、线卡叽等，销量少，进货不多。

2 京杂业——万兴顺、永兴牲、永瑞珍、恒顺兴、锦记等。主要经营食糖、盐、油、火柴、香烛、鞭炮、干果、干鱼等类。

3、百货业——和顺、时代、永新罗、福源春等 经营品种主要是衣、裤、鞋、袜、帽、毛巾、手套、搪瓷类脸盆、口杯以及小百货。

4、五金业——当时只有万丰一家，经营品种主要为电灯器材，如电灯泡、电线等，也兼营各种酒类及洋蜡烛等。

5、中药业——聚隆、胡同兴、李永源、章人和、廖吉人、何永康等。有的药店还有中医坐店诊断。

除上述外，新的情况也促进新的行业产生，丰富了旧有行业的经营内容：

1 文具业——随着事业、机关、学校等迁来，各种表簿、文具用品等要求增加，文具业随之而起，新开业的鼎新姓、益书林、捷通等几家文具店，其中鼎新姓和捷通还举办印刷厂（均系石印）承印各机关、学校表簿等用品。

2、西药业——应时而起的德和堂、中孚等西药房，销售各种西药，并能根据病情给病人服用和为外科患者简单包敷。德和堂药房还研制有健儿糖、黄金膏、黄金丹等西药成药。

3 糕饼业——永安的糕饼店，原有赖益记、赖天记、张义记等十多家，生产品种为当地人平时节日惯用的西饼、荷饼、鱼饼、麻饼、肉饼、红纸饼、绿豆饼等等地方性食品，不适合外地人的口味。随着省会内迁，福州等地的糕饼商店也迁来，开有福丰、泰源丰、启时图等好几家糕饼店。生产各种饼干、油酥饼及小礼饼等各式各样中西糕点，畅销市场。

4 饮食服务业——抗战前永安饮食业比较简单，大部分是小食点心店，如扁食、面条、粿条等。省会迁入后，较大的菜馆除原有的四海春和一品轩外，增加燕江楼、开怀楼、快乐轩等十多家可供酒宴的菜馆，备有各式各样中西餐。永安人过去未见的鱼丸、糖丸、水饺等小吃点也有了。旅店业也从西门